

上甘岭战役亲历记

◆ 周培松

70年前,我参加了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回顾过去,要说的话总有很多。

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上海西藏中路大陆旅社,我无意中见到了原炮七师宣传科金绍钦同志。他也发现了我,向同来的人介绍:这是我的老战友,他参加过上甘岭战役,在前线打得炮火横飞,他一点也不怕,在炮阵上跑来跑去……

是的。当时我的确在上甘岭前炮阵上参加过战斗。我忘不了上甘岭。

1952年10月,我从团部到二营调查工作时,并不知道这场扣人心弦的大战即将爆发。我在营部办完事后,还要去五连的炮兵阵地。我是晚上上山的,路上不时闪着敌人的照明弹。敌人的大炮,除了封锁前沿阵地外,还不时用炮火封锁我方上山的道路,有时敌机还来捅捅乱子,丢炸弹,扫射机枪。

我方上山下山的步兵与炮兵,在夜间也个个都戴着伪装帽,借着照明弹、月光和手电筒,运输弹药、转移伤员和换防,人影幢幢,没有硝烟,但是杀气腾腾。有时小路上,突然闯出一队人马,在指挥员压低的口令中急步前进,队伍里丝毫不闻嘈杂之声。有的队伍还夹杂着前线下来的担架,担架在崎岖的山上,都是由两个战士抬着,颠簸得很厉害。有的担架上的伤员浑身是血,有的还从帆布上一滴一滴地流淌下来,抬担架的人军裤都染红了,不过,没有一个伤员大呼小叫的。

那一天,我不知道避过敌方几次封锁,摔过几跤、忍住伤痛,总算到达了五连炮阵地。五连共有四门122榴弹炮,都安置在坑道中,敌人根本看不见。大炮和炮手的活动天地,都是战士用铁镐在石质的山上,挖掘出的一个大坑道。阵地上面,已不是岩石,我踏到上边时,分明感到那是一层层石渣碎片,有的地方踩上去就如同一块缺水的泥淖。这满山的石渣碎片,就是敌机和大炮的“赫赫战果”。

阵地上硝烟滚滚,如同用炮弹、炸弹、地雷犁了无数遍,看不到一树一草一叶,也看不到一点生物的迹象。在头顶上,就是敌人的校正机,从早到晚在“值班”,如果发现我方阵地的动静,他们就指挥敌军炮兵进行射击……

形成极为鲜明对比



■ 本文作者的参军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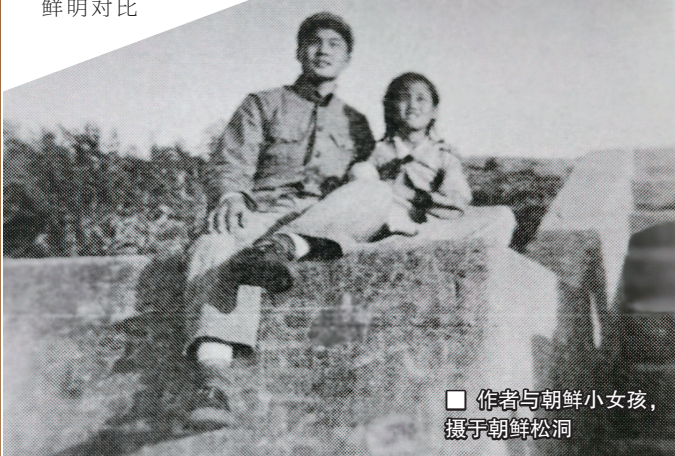
的是,我军炮兵在坑道中却是该干什么干什么,不急不慌,处之泰然。——敌人炮兵用穿甲弹,能打翻坦克,也不能打穿山里的坑道呀!

我进入阵地调查工作,和战士相比,算不得什么。战士们奋勇杀敌,你能袖手旁观吗?我在调查采访之余,接电话线(电话线在被敌炮打断后,是需要露天中查找和接通的)、送弹药、倒水、记笔记等等,干得特别起劲。

突然,坑道里听到一声极短的声响。发射口射进了一发炮弹,阵地上轰隆一声,硝烟呛鼻。我只觉得耳朵嗡嗡发响,但人还有知觉。刚刚和我讲话的一名炮手,却已倒下了。怎么回事?战斗间隙,我们检查了敌人打进来的炮弹,是155榴弹炮(瞬发信管),炮弹只炸了两月。敌人大概是心不在焉,或者是造出的次品。这发炮弹减少了战友的伤亡,这是我的一次死里逃生。在这近三年的战斗中,我有几次挨上了“擦边球”。纯粹都是侥幸。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我疲惫不堪地仍按着原路下山。在半山的路边,我看到了一具美国飞行员的尸骸。两只副油箱,只有一只烧焦了还留在路边。机体几乎都已经光了。飞行员也早已死去。这里的景象正反映出前沿战斗的惨烈。步兵与炮兵,这一连与那一连,前方与后方,我方与朝方,都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无比英勇。

人类生命中永恒不灭的事物,不仅有文化、哲学、科技、艺术、教育,更有伟大的情操和理想。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出力量才是更为重要的。从战斗中激发出来的歌声,其意义会比平常生活中获得的更多、更为深刻。



■ 作者与朝鲜小女孩,摄于朝鲜松洞

▲ 作者在野战医院所在集体荣获集体二等功的立功纪念证,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第十八陆军医院一分院颁发,1953年12月于长春

▲ 作者在参加抗美援朝医疗团工作时荣获贰小功的功劳证,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十六陆军医院颁发,1951年6月3日



▲ 作者1951年参军前的照片

叫我扛腿。因为有一个布架子遮住我,我看不见他们手术。只感到有一种震动和“咯吱、咯吱”的声音。

大约过了半小时,一只大腿落下来了!院长吩咐我把这条腿送到六楼焚化炉里去。我愣住了,心怦怦跳。但我知道,这是命令,必须执行。我才21岁,刚从学校毕业,没见过这场面,也只好抱着那条缠了绷带的大腿,从三楼爬到六楼,眼泪就在眼眶里转。可到了六楼焚化炉旁,我看到了那么多的手啊,脚啊,还有单个的手指,脚趾,甚至还有一只烧焦的耳朵,我也不知道害怕了,脑子里冒出这么一句:“这就是最可爱的人啊。”我站在那里,三鞠躬。

病房里住着很多烧伤、冻伤、枪伤的伤员。绝大多数是四肢伤。还有背部大面积烧伤的。与伤员聊天中我了解到,朝鲜战场大都在山区,敌人飞机在山谷中低空飞行、机枪扫射,地毯式扔炸弹。战士们在掩体里,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大家趴在地面动也不动。所以很多人背部烧伤了,四肢冻伤了。

我护理过三名重症烧伤病人。他们背部烧伤达90%。为烧伤的伤员换药是一件既繁重又心细的活儿,换一次药至少需要两三个小时。一个伤员换下的敷料,就是一大桶。伤情不一样,清创时用药、用纱布也不一样。我们一上午给他们换药,要忙到下午1点才能下班去吃午饭。每天如此。炊事班长知道了,给我们留饭留菜,还保温着,我们不管什么时候下班,都能吃到热乎乎的饭菜。

部队中处处充满着大爱。令人刮目相看的还是那些“最可爱的人”。那时虽然是寒冬,但每给重症烧伤病人换一次药,我们自己的内衣都被汗湿透了,就是这样,伤员疼得额前脸上冒大汗珠子,但仍咬紧牙关,不说一个“疼”字,不时鼓励我们说“你们辛苦了”。

谁是最可爱的人,就在眼前!什么叫锻炼?他们和我们都在锻炼,锻炼了坚强的意志。

4

这是一场大战,伤亡不小。当时有卫生列车,不定期从前线运载伤病员回国治疗。列车首先停在安东市(现在为丹东市)近郊一个山区小站“五龙背”,这里就是伤员分拣站,进行初步处理,再发送到铁路“长大线”沿线各个医院去。我参加了接收卫生列车的工作,一次接收了1000多名伤病员入院。我想简单描述一下每个环节的工作,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政机构根据实际情况的组织指挥能力,看到军民团结的伟大力量,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干部和群众惊人的工作效率。

第一步,长春市规定各居委会组织3-5副担架,自备被褥,抽调10-15名担架员。各个居委会行动起来,根据各自的条件解决这些问题。第二步,医院总部所有医务人员全部到火车站,检查标记,看伤票,指明送往的地方。分拣站给伤病员发简单的伤票,同时在左臂绑扎上一条布带,黄色表示是外科,蓝色是内科,绿色是五官科,黑色是传染科,紫色是精神科,红色表示是危重伤病员,必须及时处置。我记得,比较重的外科烧伤的伤员,右臂上同时绑扎有黄色和红色两种布带。第三步,伤病员被送到各分院(分队)后,快速有序地安置到各个病房。大量工作紧张有序,忙而不乱,效率极高。每个人都热情高涨,没有谁叫苦叫累。手术一个接一个,总要到午夜12点才能休息……

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我明白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真正涵义,至今牢记在心。

野战医院救治『最可爱的人』

◆ 费静兰

1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开始时,我正在南京某专科医校读书。我是冬季毕业班,还没有期末考试。11月,学校动员师生参加“抗美援朝”。我第一个报了名。经过校方审查,上报南京市卫生局和华东军区华东卫生部批准,我成为“抗美援朝医疗服务团”的一名成员。

“抗美援朝南京市医疗团”由200多人组成,分成十三个队,一个团部。其中六个医疗队,六个手术队,一个血库队,配备了专家教授和资深医生,还配有护士长、药师和我们这些大专院校毕业的学生。当时,华东军区华东卫生部抽调华东军区的医务人员组建了十三个野战医院,我所在的第一医疗队被分配到锦西第五野战医院。第一医疗队共有16名成员,其中队长1名(内科专家),副队长1名(专家),高级医师1名,医大应届毕业生2名,医大五年级学生3名,药师2名,护士长1名,护士4名,炊事员1名。医院下面分为五个分队,一个队相当于一个科室。我们医疗队分配在重症病区,配合医院工作,队长和副队长还要到其他各队去巡诊(会诊)。

那时锦州地区几乎看不到一条像样的大街。大多数民房都是土坯房,当地人叫“干打垒”,就是用黄泥和秸秆或稻草垒起来的房子。医院就用这样的民房做隔离病房或重症病房。一套民房可收容60-80人。一名医生要负责这样两幢房子的病人,工作量是惊人的。

2

第二天,我就正式上班了。我被分配到配药组。一个病区就是一条街,没有手推车,也没有药杯,更没有服药单。但是,无论什么环境,在共产党员手里总有办法来完成任务,这是我看到的现实,在思想上留下很深的烙印。

一位老同志负责带我。她看上去二十六岁,很稳重。她帮我在腰上围一段约有八尺到一丈长的白粗布,上面缝了许多小口袋,注明房号、床号,每个口袋里装着用纸包好的口服药。我像朝鲜人一样,穿上长长的白色布裙子,手里提着一把水盂,老同志带着我沿着街进入每一幢房子,挨个房间把药送到伤病员手中。一个上午才把药发完,下午如此再走一次,还要把次日早上的药也先发下去。

我们医疗队的任务是协助野战医院建立正规的医疗制度,包括培训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还要“手把手”教、“一帮一”带,重点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半年后顺利完成任务。我亲身体会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管有多大困难,只要和群众一条心,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我过去读书多年,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干什么。这次在革命大家庭里生活、工作、学习,逐步明白了活着的意义。

我想留在部队,也做一名无产阶级战士。

3

1951年7月,我回到南京,被分配到南京市工人医院保健科。10月,华东军区革命委员会、南京市动员市民“参加国防建设”。我毅然报名参军。经过一个月的调查,政审,工人医院在五六百名职工中只批准了两个人,其中有一个我。

到了长春,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医管局报到,之后去了第七野战医院第36队(分院),被分配到病房当护理员。没过几天,调到了手术室。一进手术室,我惊呆了。空间小,设备少,想象不出如何开展工作,又如何完成那么多的手术任务。我站在一旁发愣,听见分院长(相当于科主任)喊我:“小费子,你今天任务是站在手术床后面,扛住伤员的大腿。”我站在那儿,看到两位军医正在给伤员的脚上缠绷带,从脚尖开始缠,好紧好紧啊,一直缠到大腿上,这才



▲ 作者在野战医院荣获三等功的立功证,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第十八陆军医院颁发